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困境及其应对

■ 陶志欢

(上海大学 大学生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摘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困境可以从理论信服度有待提高和实践信心度有待加强两个方面来呈现,这主要是由多元观念蔓延下一元主导面临挑战、工具理性强势下价值理性渐趋式微、预期需求提升下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拟态环境生成下思辨能力显著缺乏造成的。高校要以加强教育者自身的信仰教育为前提,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性和亲和力;以提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力为切入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展示其实效性;以创新信息公开制度为契机,培育学生以信息思辨能力为核心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质量 现实困境 应对策略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针对学校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专门要求;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同月,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的通知》;2019年4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2019—2023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对青年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出六点要求。这一系列加速呈现的讲话和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从逆向思维的角度也恰恰说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实存在质量亟待提升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这里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眼中分别是指理论和实践,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形式和改造世界的两个主要环节,虽历经时代变迁,但仍保存在我们的思想之中,它几乎左右着人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是人们观察与思考各项工作的主要方法,并且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统一体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主体性与客体性、价值性与真理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以理论为先导、以实践为基础,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彼此作用的互动关系。为此笔者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呈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并探究其原因,进而寻求应对困境的有效方法。

收稿日期:2019-11-08

作者简介:陶志欢,上海大学大学生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年思想与教育。

一、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困境呈现

1.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信服度有待提高

强调国家意志和社会需要是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 and 为谁培养人”价值导向的必然选择,但说教色彩过浓和灌输痕迹过重、易忽视学生正当权利诉求和个体主观感受,不利于其从自身体验出发理解理论的真实性并落实其价值性。理论阐释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但教育者在现实生活实际中,“证实偏见”不同程度地存在。它往往基于教育者自己的理论预设或价值偏好对事实进行预先取舍,这种经过裁剪和过滤的事实也许表面上增加了理论说服力,但由于不是客观事实全貌,从而具有伪实证的特点^[2]。加之个别教育者有时还会刻意回避和故意掩盖某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屏蔽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和鲜活问题,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分析和判断缺乏辩证性和预测性,学生接受的理论有时还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检验,这些都会导致大学生接受的教育和现实感受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对应、不统一、不协调,容易让他们产生困惑,使其思想产生波动^[3]。加之少部分传道者自己就未必真明道,即使真明道,也未必真信道。教育者先天的底气不足使学生对理论的真理性产生质疑。

事实上,意识形态受经验的制约,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人们会改变其观点,去发展一套与经验更加相符的观念^[4]。学生的价值观往往源自其耳濡目染的事实和在社会现实中的真实感受,通常更倾向于按照自己对事物的认识给出判断,对了解原初事实甚至事物反面情况的要求有时显得更为迫切,而对经过有意或无意加工从而戴着面具的所谓“事实真相”常持怀疑态度。尤其当他们获悉某些所谓“事实”与真实情况并不相符,或他们经由自己的渠道获知了不一致的情况时,就会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从而对所传授理论的真理性产生怀疑,致使学生在失望之余反而更易于接受非主流乃至完全错误的思想观念。

2.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信心度有待加强

理论上的不信服会导致实践上的没信心。当前,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党团干部、辅导员、班主任负责的主阵地教育还未完全协同,两者之间互相消解和内耗现象还普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5]但现实中“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所承载的“课程思政”还未有效衔接并实现同向同行,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模式还未完全建立,师生良性互动的亲密关系特别是高校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还有待加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6]但从实践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虽有考勤约束下体现身动的到课率,但反映心动的抬头率和引发共鸣的点头率较低。在课外教育上,党政工团系统忙于传达学习中央精神、督促文件和会议落实,辅导员、班主任专注开展主题教育与实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但由于文件话语过多、学术话语过空、会议话语过滥,注重形式而忘记初心、生活话语不接地气等问题确实存在,使得“面对人们的一些思想困惑、政治迷茫、道德困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能力有限,工作效果不明显,缺乏真正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力量”^[7]。

资料显示,近年来大学生中认为学校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果、有收获的人数多徘徊在被调查对象总数的35%左右,而认为这些思想政治教育无所谓、无效果的人数比例却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8]。我们就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核心的内容和目标——正确政治信仰的培育来说,有学者对上海10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政治信仰并不太重要,而认为政治信仰非常重要的学生中也有半数的人表示“不太明确自己的政

治信仰或者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政治信仰”^[9]。更让人忧虑的是,当期望落空、伤心变成丧心、信心变成灰心,就会严重影响到学生下一步的行动选择,反映在学生身上,极易削弱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实施举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信心。

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困境成因

1. 多元观念蔓延下一元主导面临挑战

哈维曾提出“时空压缩”的概念,他指出,短暂性越强,需要发现或者制造某种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压力就越大^[10]。相较于西方现代化所需的时空条件,中国的现代转型是在时空压缩环境下进行的。时间急、空间广、幅度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及时对多变的现实诉求给出成熟的理论回应、科学的精神重建、完整的价值修复和合理的意义诠释。主流理论的解释力和引导力跟不上,其他非主流思想就会乘虚而入。人们对现实问题及其走向必然有不同解答和各种设想,这些都加大了把学生多元观念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难度。加之国外反华势力希望主导议题设置、实现话语引导和成就舆论霸权,他们要给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戴上“普世价值”的帽子,伪装成“终极真理”,对学生进行柔性渗透,试图从其身上找到颠覆现政权的突破口,实现所谓“历史的终结”。当前,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服务的一整套理论邪说正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智慧和方案发生猛烈碰撞。资本主义的逐利逻辑和社会主义的共赢逻辑在观念形态上出现激烈拉锯。意识形态领域的攻防战不论在现实世界的话语权较量还是“虚拟场域”的数字化争夺,始终是硝烟弥漫。能否打赢这场持久战,关系到我们政权的生死存亡。

目前,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着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着市场逐利性的挑战,传统教育引导方式面临着网络新媒体的挑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着敌对势力渗透争夺的挑战。实践中,部分教育者受现实剧变和多元思潮交互渗透的影响,“立场正确而行为暧昧”式的知行分离进而产生的“看客”心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少数教育者“迫于生计而传道、并非信仰而育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进而出现理想信念的弱化,再加上部分受教育者出现理论上认同的道德规范并未切实转变为实践中的道德行为,因此,如何在多元社会意识形态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在多变社会现象中谋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识、在多样利益关系中探寻“最大公约数”建立利益认同并达成思想共识,从而解开“戈尔迪之结”、取走“达摩克之剑”、封闭“潘多拉之盒”,既考验思想政治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纯洁度和坚定性,也考验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2. 工具理性强势下价值理性渐趋式微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他看来,正是两种理性矛盾的张力造就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一切成就和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大成就更是神化和固化了人们对工具理性主导性的观念认知,以致在西方社会也引发了对“上帝之死”的拷问和“人类万能”的遐想。在 Neil Postman 眼里,文化正在向技术投降,“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都是“技术垄断”惹的祸。此理论为分析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彰显求真的科学精神和为情的人文关怀提供了启迪^[11]。

当前,以大学排名为典型表征的竞争使得不少高校把过度推崇工具理性、偏重强调眼前利益作为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选择,这使得本该是充满生命活力与理想飞扬的教育涌动着无法自抑的工具化倾向。学科布局上以快速产出经济效益的专业优先;人才培养上以具有所谓实际应用价值的技能提升为主;考核评价上以学生就业的数量为主要标准。甚至对不少学生而

言,“学习有用技能→通过相关考试→增强就业能力→获得地位财富”已是其接受教育的内在行动逻辑,当教育不能提供这些帮助时,“读书无用论”就会产生,这是实用化的结果,更是人类日益沉浸在科学技术不断战胜自然和突破历史束缚从而取得巨大成就后的满足感,进而导致其工具理性不断膨胀的必然结果。

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侵占了一些本该留给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空间,教育对灵魂唤醒的本质有所偏离,过多思考正在驱赶深度体验。专业教育中欠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中难寻信仰教育,以致造成思想教育专业化和信仰教育知识化现象,从而使得教育的育人价值与职业功能未能平衡共处。教育强调雕“材”和琢“器”,对成“人”的教育有些集体忽略或选择性遗忘,以至于克龙曼感慨道“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12]这种对规范性的过度追求和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视为虚无的概念总体而非现实的鲜活个体的教育模式化倾向,造成对主体自主性的忽视和客体差异性的忽略,且对个体实用性的关注又导致对象的自我异化。当学生大多将思想政治教育期望作为自己合乎工具理性的追求时,教育通常会被加强太多的实用功能,其活动本身的价值理性会被忽略,培养人的正确轨道就会偏离,从根本上说,做人的工作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不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3. 预期需求提升下有效供给明显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着教育者思想行为状况与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状况、教育者思想行为状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状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客观要求与教育环境状况四对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又集中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和需求端之间的矛盾。受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供需矛盾表现为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素质提升需要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供给之间的矛盾。学生政治素质通常会随受教育程度和文明素养的提高而提升,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期望值往往会水涨船高,他们希望教育者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尊重青年成长规律,沿用好办法、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对关乎其生存发展的问题给予科学解答,把握他们的“心结”,拆除他们的“心墙”,重塑他们的“心灵”,平息其看不惯、明晰其看不清、解析其看不透,最终弥合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心理矛盾和内在冲突。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青年要顺利成长成才,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整枝时就要整枝。”^[13]否则,他们就会对教育者所传授的理论和实施的举措产生怀疑。

随着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其对自身素质的提升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但在“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的饱和思维和行为惰性的路径依赖潜意识的支配下,学生有时并不太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方面和已取得的成绩,反而却更关注它的不利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导致学生在评价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时容易缺乏客观公正性。如此,学生会在不自觉中放大了问题而缩小了成绩,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境遇陷入恶性循环。而教育者往往习惯刻意强调自身的真理性而回避其价值性从而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实在性和价值正当性内在具有的互生性和统一性,且在其教育中的丝毫不加掩饰更是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实际上,过于直白地宣扬思想政治教育真理性、客观实在性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效应递减的重复刺激,而且由于它抑制着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尊严感的确立,驱散其独立探究社会的好奇心,因此还可能产生你越说它如何正确,他却越不想听的逆反心理。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供给者本位”理念导致的“供给”与“需求”不对称不衔接的状况亟待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 拟态环境生成下思辨能力显著缺乏

拟态环境亦称“虚拟环境”,或曰“似而非”环境,它并非客观真实环境的镜像再现,而是具

有“后真相”的特征。其源于信息供给对人们认知兼具扩展深化和限制约束的两面性以及网络时代信息易于产生和传播,但却难于辨识和分辨真伪的双重性。学生虽受益于网络媒体得以显著提升媒介力,但思辨力并未明显增强,凡事喜欢跟着感觉走,惯做“键盘侠”,且在从众心理下以“看齐”为本、“一致”为规,从而不自觉地变成“乌合之众”。加之注意力短缺引发的“平庸之恶”,以致面对“真理和谬误同在、意见与情绪并存”的拟态环境根本无法洞悉包含套路的“伪装术”,即由信息多寡形成的“知沟”已渐趋消失,但由判断力强弱所致的“智沟”却愈发凸显。这一现象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网络知识中的“奥威尔现象”。为什么网络空间中的知识和信息如此丰富、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手段如此便捷,我们的认知却如此贫乏、窄化和易于被欺骗?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网络知识和网络环境的独特性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源自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智能化的选择性推送;源自于人类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认知盲区^[14]。信息生产和传输成本下降所导致的超载信息带来强势冲击对个体的时空压迫和精神消耗导致信息接收出现“收益递减律”,个体无力理性地经营网络生活导致自我认知和改造能力下滑,甚至沦为信息的奴隶进而导致自我异化。正像 Neil Postman 所说“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15]

甄别力欠缺的学生面对泥沙俱下和沉渣泛起的网络极易陷入真伪难辨的窘境和一个暂未找到解决路径的悖论。“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16]加之媒体通常热衷追求负面新闻和轰动效应,偏好将负面信息加以过分渲染以满足学生的猎奇心理,而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正面信息和已取得的成效采取选择性忽视甚至集体性沉默的态度,这印证了风险感知研究专家斯洛维奇提出的“不对称法则”,即消极事件较之积极事件更为引人注目、坏消息的来源较之好消息的来源更为可靠^[17]。学生在具有“听一半、理解四分之一、零思考、双倍反应”的信息接受反馈特点情形下,大众传媒对个案事件的放大效应和错位呈现易使学生对教育者的信任感和期望值下降,导致其无法客观公正地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举措。过度的负面导向,造成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怀有某种超然态度乃至悲观主义的情怀,甚至在某种极端情绪化情形下过度地怀疑和全盘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困境的应对

1. 以加强教育者自身的信仰教育为前提,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性和亲和力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8]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也强调,“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19]不可否认,教育者可能比学生知识更高深、见解更高明、水平更高超,但却未必比学生道德更高尚、心灵更高贵、品行更高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明确“立德”先于“树人”。“立德”就是“守道”,核心是有信仰。要加强以信仰教育为核心的师德建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应该有更严格的标准,因为教师的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政治要强”作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首要要求。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比觉悟并非比知识、是信仰教育绝非单纯知识教育的特性所决定的。只有教育者自身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完成党交给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人性的引导与培养,是公民对规则意识的内化与守护、对多元化的理解与宽容、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与认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奉献^[20]。大学教育应遵循教育本质,侧重价值澄清和意义治疗,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实用主义和工

具理性倾向,摆脱物质世界学以致用用的偏见,回归人本化、人文主义和注重价值理性的轨道,构建价值世界的学以致用道。依据 Susan Pinker 的“村落效应”理论,网络时代师生间应该少些“键对键”、多些“面对面”,使关怀在身边、关爱在眼前、关心在当面,进而摆脱 Sherry Turkle 眼中的“群体性孤独”,使功利让位权利、被动让位互动、给予让位参与、怀疑让位信任、迷失让位明确、异化让位本真,最终实现失望感让位获得感。

回归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的本真,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要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导,把尊重和完善人作为价值导向。即“凭良心”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 and 为谁培养人”的价值问题,用“拼能力”解决“如何培养人”的技术问题。以超越主体间性的他者性理论来直面师生关系由情感逻辑向利益逻辑加速转化从而呈现异化状态的客观现实,破解教育者“我说了算”的惯性思维与受教育者“我说了才算”的主观诉求间的矛盾,实现互动主体从单向控制走向自主建构、互动方式从机械灌输走向心灵对话、互动内容从封闭预设走向开放生成、互动目标从知识占有走向全面提升,使教育配方更新、工艺更细、包装更潮,以真情实感和需求发现代替空泛说教和要求主张,以推心置腹和换位思考代替强制灌输和自我中心。建立要素源于学生、表达贴近学生、传播吸引学生的话语体系,做到既有学术品格,又有魅力人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六个要”和“八个相统一”^[21],使学生在积极情感体验中实现思想内化和行为转化。以教育者“火”起来保障教育“活”起来。同时规避“表象驱逐内涵、搞笑压过幽默、思想淡出对话、感性打败理性、内容淡出形式、夸张代替真实、形而上的关心关怀让位于形而下的自娱自乐”等现象,更要防止以教育对象为中心的过度感官满足和精神刺激冲淡以教育者为主导的鲜明意识形态引领。做到既坚守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纯情,又不失价值导向的纯正和科学规律的纯真。

2. 以提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力为切入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展示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生成的逻辑在于高度契合现实需求,但前提是要知道现实需求是什么,这就要求提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力,找到思想政治教育满足现实需要的切入点、引入线、交叉面和互动体,实现教育理论和生活实践的无缝对接。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还需通过生活实践的改进程度和内心体验的满足程度来展示,因此从根本意义而言,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在于思想上了解学生,核心是以科学理论说服学生,使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学生从心理的自觉尊崇到行动的自发追随,这就要求理论具有彻底性。所谓彻底性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思想政治教育的旨归是给学生解疑释惑从而引导其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人生方向,同时也是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宣扬国家意志的实践活动。宏观上是解决培养人的目标、方向和路径的问题,微观上是回答学生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怎样做人的问题。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免不了要说理,但这个过程有时却是痛苦的,因为真理往往带着赤裸的表象和残酷的真相,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理不是一枚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22]卢梭也曾说“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向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示它。”^[23]鲜活的社会实践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种种问题症结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实践排斥理论,且日益呈现相对静态化趋势的意识形态未能很好地把控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其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虚假统一,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其实,思想政治教育是合身心的价值理想性与合规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是理想超越性和现实历史性的统一。要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既离不开也不可能凌驾于现实之上,它应该是内含于生活之中的过程。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向个体敞

开并保持有效,就需要把自身置于环境的生活形态之中,在内容、方法和话语上选取个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素材^[24]。消除“书斋化”和“经院化”,走向“生活化”和“现实化”,要实现从生活中“元叙事”到网络中“微叙事”的转变,发挥其利益调节和疏导功能。改变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偏重学理化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实现从抽象理论推演到个体生活叙事的转变,做到文本叙事的生活化、记忆叙事的时代化和图像叙事的普及化。不能让理论飘在空中,既要讲清“怎么看”,又要说明“怎么办”,更要接生活地气、解现实饥渴。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感染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凝聚力,达成差异化共识。

由于集体无行为能力,只有隐喻意义,因此社会文明最终要由个人来展现。要改变学生对社会要求高和对自身要求低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关注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消除书本与现实生活的鸿沟,打通知识殿堂与实践庭院的界限,兼顾虚拟空间和真实生活两大场域,推进理论与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合力育人模式,实现理论之虚与实践之实、网络之虚与现实之实、思想之虚与生活之实的有机统一,把解答学生思想困惑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用鲜活事例传递抽象道理,用生活道理诠释马列原理,教会学生戴正理想信念的“帽子”、扣好核心价值的“扣子”、理顺文化审美的“领子”、撸起行动品质的“袖子”、选对职业规划的“鞋子”,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既要理解青年所思所想,为他们驰骋思想打开浩瀚天空,也要积极教育引导青年,推动他们脚踏实地走上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25]最终使学生具备透过现象把握真相、通过表象认识本质的能力,实现从认知矫正到话语沟通,再到行为转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目标。

3. 以创新信息公开制度为契机,培育学生以信息思辨力为核心的媒介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公信力源于报道的客观真实,这要求新闻宣传要以权威信息驱逐拟态环境下的虚假信息。克里斯塔基斯就认为,恐惧与怀疑也会传染,这会让权威性大打折扣,而权威性是结束这种流行病必不可少的。”^[26]高校要建立由第三方评估的体现常态化和及时性的信息发布制度,以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沉默的螺旋机制”弱化而导致的舆情扩散。另外,必须加大网络媒体行业自律,不能把学生全部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会使其陷入不能承受之重的泛道德化困局之中。要客观公正地报道、分析和判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和问题,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为刻意迎合而失态,更不能因盲目介入而失准,因过度渲染而失范。要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努力消除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不客观的负面认知,最大限度地切断“潜传播”,尽力挤压负面信息的“潜空间”。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我们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27]网络媒介时代更是倍增了这种局限性,因此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舆论环境,防止学生成为“乌合之众”,使其面对社会思潮和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时具备批驳错误观点、澄清模糊认知、吸收合理成分的能力,培育其以信息思辨力为核心的媒介素养尤为关键。总的原则应该是坚持《荀子·大略》中的思想: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面对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28]。具体来看,这里可以有“道”和“术”两层进路。对于“道”,要教育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识别信息、看待问题,坚守信息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增强网络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始终做到在信息社会中寻道、尊道和守道。对于“术”,

要培养学生敏锐的鉴别力、严谨的分析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虚假信息通常具有缺乏可靠数据来源和权威发布渠道从而无从验证,运用夸张修辞法、展现绝对情绪观、采取诱导性表述和鼓动式宣传等共同特征。要养成学生多角度、全时空分析问题的习惯,学会对信息来源进行多方核对和验证,对搜索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和理智选择,不偏信盲动和照单全收。倡导研讨式教学和非标准答案式考核评价,通过课堂教学尤其是人文、逻辑、哲学类课程来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批判精神和质疑意识。要使学生透过浅层看深层、越过显层看潜层、剥开表层看内层,对于看似“价值无涉”的信息所负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要有深度解析的自觉意识,探寻物质信息背后的观念意义世界、客观行为背后的主观思想世界,善于把握信息传播者的意图。同时还要提升学生面对海量信息和复杂环境的知识建构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实现以“道”来保障“术”的价值底色,以“术”来呈现“道”的实践智慧,使两者刚柔并济、显隐一体,共同服务于学生以思辨力为核心的媒介素养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 [2]常伟《社会科学何以走出伪实证研究》,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
- [3]冯培《要客观辩证地认识和评价当代大学生》,载《北京教育(德育)》2015年第6期。
- [4]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 [5][6][19][21]《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
- [7]隋牧蓉《试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有效知识供给的不足与增进》,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年第2期。
- [8]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第三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 [9]王曼杜建《网络视阈下大学生政治信仰培育的新路径》,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3期。
- [10]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5页。
- [11][15]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
- [12]克龙曼《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诸惠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 [13][25][27][28]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 [14]李静瑞肖峰《论网络知识中的“奥威尔问题”》,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5期。
- [16]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 [17]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65页。
-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 [20]卢岚《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困境与出路》,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年第2期。
- [2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页。
- [23]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下卷),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18页。
- [24]周琪《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成、生活形态和自觉实践》,载《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0期。
- [26]克里斯塔基斯·富勒《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简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责任编辑:邢哲)